

論 点 摘 編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宋月红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7期撰文指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第二个历史决议”)40周年。这一决议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以回顾和总结建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为主题,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于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之中认识和把握党史、新中国史,并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辩证统一起来,把党史、新中国史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彰显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方向与道路、进程与前景、成就与经验,深刻蕴涵着党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人群”的异化肖像:

本雅明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独特阐释

郭广在《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0期撰文指出,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鲜有人深入研究本雅明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阐释问题。20世纪20年代末期,本雅明选取19世纪最具现代性特质的发达资本主义都城巴黎为理论阵地,通过承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性分析,以现代化都市特有的人群意象为入口,从历史现象学的角度,在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展示出都市人群在行动表达、外在面貌、主客界限、精神意识、内心体验上全面异化的真实肖像。透过人群的异化肖像,本雅明运用一种辩证的历史方法,揭示出资本主义历史无限进步的虚假意识形态乃是造成都市人群全面异化的文化根源,促使大众从过去的历史事物中捕捉住

历史的断裂之处,在当下时刻将其现实化为革命行动,以打断资产阶级建构的虚假历史连续体,克服人类全面异化的生存状况。由此,在异化的主体、表现形式、产生根源和克服路径上,本雅明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作出了独特的理论阐释。

“入世”后的越南电影

崔军在《电影新作》2021年第6期撰文指出,“入世”后的越南电影发生了显著变化,显示出了活力与潜能,其中描写的家庭往往都经历了一个由圆满和自足走向危机与破碎的过程。当代越南城市呈现为矛盾的混合体,故乡被界定为乡村,主人公都是来自异乡的过客,他们不仅都会“返乡”,而且乡土都被赋予诗意。城市标识出越南传统文化正在经历的边缘与挤压,乡村则以一种浪漫的笔法勾勒着民族之根。主人公一方面顺从于外部社会现实,一方面又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记忆和对于民族传统的认同。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河南推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研究

李丽菲在《管理工程师》2021年第6期撰文指出,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是中小企业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实现异军突起的重要途径。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河南中小企业面临着国产替代、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新型消费提质增效、新基建带来新发展空间等历史机遇,但也面临着出口型中小企业的断单与断链、传统中小企业被淘汰、单打独斗的中小企业发展不可持久等风险。因此,河南中小企业只有坚持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以良好创新生态为依托,以龙头企业为支撑,以供应链金融为抓手,以数字化转型为方向,才能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治理”理论下网络平台规制标准研究

李梦琳在《公共管理理论》2021年第11期撰文指出,数字经济技术在推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网络空间公众行为规制愈加复杂。“新治理”理论下,网络平台等私人主体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主体,规制标准亦成为平台软法治理中规范用户行为的重要形式。在线外卖平台作为新一代网络平台私人规制者采取的算法规制与政府规制相比具有显著优势,而算法涉及价值观和导向的设定必须通过规制标准的制定来平衡经济价值与非经济价值的冲突。平台规制标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通过算法规制可以保证规制的有效性,标准制定的程序性环节则可以保障规制的正当性,故应引入平台准入合同的“强制性”约定条款、平台退出机制、市场竞争淘汰机制和法定责任机制来确保规制的可问责性。

《共产党宣言》的全球化逻辑及其当代境遇

刘怀光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撰文指出,《共产党宣言》在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就给出了一个关于全球化发展的“世界性”的理论与逻辑。资本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真正的全球性共同生存生活的全球化机制。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之间具有复杂的互动、共生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两级分化趋势及其背后的资本-劳动-市场力量构成了全球化的一般性逻辑。在世界市场中,各个民族、国家也开始进入一体化进程。全球化发展的表现则是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个方面都表现为世界性生产的一体化发展,表现为民族、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共同的生存、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世界性理论中涉及的技术、经济一体化,利益关系与民族国家等问题依然是今天我们探讨全球化的核心问题。运输、通信技术,尤其是建立在更广泛的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经济体系的发展是划分全球化发展阶段的根据。全球化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的冲突,它表现为全球化中三种利益不均衡。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是这种不均衡的结果,是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全球性扩张的症状。

不确定条件下的乡村中小学布局优化

陈玉龙等在《运筹与管理》2021年第11期撰文指出,学校的合理规划布局是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办学效益和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已有许多学者研究了学校的布局问题,但基本上都忽略了交通网络条件以及不确定因素对学校布局的影响。探讨旅行时间不确定条件下的乡村中小学布局优化问题,以最小化学生上学的旅行成本、学校建设和道路建设成本为目标,并在随机 p -鲁棒优化的基础上构建旅行成本不确定条件下的设施区位设计模型构建,再使用混合模拟退火算法对所构建模型进行求解很有意义。实例应用说明所提出的模型和算法能够有效解决乡村中小学的优化布局问题。通过检验成本预算以及鲁棒水平的变化对学生上学旅行成本的影响,进行参数敏感性检验,结果表明鲁棒水平和成本预算的变化对目标函数值和旅行成本都有显著影响。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了县域粮食生产吗?

赵和楠等在《地方财政研究》2021年第11期撰文指出,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是中央政府用以提升县级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的重要举措。研究发现:一是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显著促进了县域粮食生产,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二是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县域粮食生产的短期效果并不显著,具备一定的滞后性,长期对县域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三是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主要通过激励农户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化肥施用量、提升农业机械总动力等路径促进县域粮食生产。为更好地发挥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中央财政应继续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提高产粮大县利益补偿规模。同时,探索以“大专向+统筹”的政策设计优化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使用结构,并重视对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使用开展绩效评价。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设研究

司忠华在《高校辅导员》2021年第5期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设是赢得人民拥护、巩固执

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增强党内团结、维护党的权威的内在要求,亦是提高党的声望、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基石。党的形象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执政为民的“人民公仆”形象、开放创新的“时代先锋”形象、责任担当的“民族脊梁”形象。新时代加强党的形象建设,应当善于借鉴真抓实干、不搞形象工程,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重视宣传、维护正面形象,严格要求、规范党员言行等历史经验与做法。

不同类型农业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赵和楠等在《统计与决策》2021年第21期撰文指出,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应审慎渐进地推进,短期应继续坚持,长期应逐步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要更加重视财政土地治理项目建设,推进“藏粮于地”战略的深入实施。要加大对中低产农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财政扶持,扩大可用、优质、高产耕地的面积,夯实粮食生产的耕地基础,增强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保障耕地生态综合治理的财政投入,除小流域治理及土地沙化治理外,应将耕地污染物检测及污染耕地恢复治理纳入其中,以减少耕地衰退和净化生产环境,保障粮食高产优质;采取PPP等多种投融资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功能,引导并提高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治理项目的比重,减轻经济新常态下的财政支出压力。要注重多元补贴支粮政策的协同配合,强化政策效应的动态评估。注重包括粮食最低收购价、农机购置补贴、财政土地治理等在内的多元补贴支粮政策的协同配合,对重点主体、重点环节实施不同的补贴支粮政策,释放政策组合效应,促进粮食稳产增产;强化对补贴支粮政策效应的动态评估,对产生效应递减的补贴支粮政策应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以优化补贴支粮政策结构,保障粮食增产效应的持续稳定释放。

产业结构对经济周期的门限效应检验

师俊国在《统计与决策》2021年第21期撰文指出,总体来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推动经济周期扩张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尤其是第二产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最强;第三产业、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对

经济周期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有待改善。而重工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推动我国经济周期方面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显著推动了我国经济周期的扩张。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提高,重工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由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转变为背离比较优势,因此需要加速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使得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从而更好地推动经济增长。我国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匹配程度的改变对产业结构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没有发生显著的效应,这主要是因为在本期内我国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匹配程度变动极小,以致无法通过计量统计方法反映其对产业结构对经济周期影响的效应。

城乡互动下农村土地市场化与脱贫效应

王亚晨等在《统计与决策》2021年第21期撰文指出,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具有正向的脱贫效应。2012年以前,脱贫指数较低,农村土地市场化水平较高,农村土地市场化对脱贫有向上的拉动作用。随着2016年中央对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的规范化引导,土地市场化对脱贫又产生了较大的推动力,土地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从而产生指数增长的脱贫效应。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对脱贫具有正向效应,随着农村土地市场化的推进,农村土地实现合理“入市”,在流转过程中产生更大的收益,使得农民收入提高,更多的农民享受到土地市场化政策带来的红利,脱贫步伐逐步加快。农村脱贫能推动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2012年以后,农村脱贫明显拉动土地市场化流转。农村脱贫能推动土地市场化,加上脱贫效果自身的延续和加强,对农村土地市场化会有长期的带动效果。随着农民逐步实现脱贫,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加,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降低,劳动力得到解放,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从事附加值更高的非农活动;土地流入方通过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规整土地,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

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道

刘志军等在《中国考试》2021年第12期撰文指

出,随着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持续推进,综合素质评价成为改善教育评价生态的关键举措。当前,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存在偏离育人理念、评价过程失序失范、过度追逐等级呈现等现实困境。基于多维度的审视,其背后受到评价思维、评价理论、评价文化等因素的阻滞。为此,应以理论探析定位综合素质评价的本真价值,以实践举措优化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程序,以多元方式增添综合素质评价的过程色彩,从而促使综合素质评价走出困境、切实落地。

楚国鲁阳关述论

陈习刚在《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历史上有两个鲁阳关,楚国鲁阳关是其一,并且是鲁阳关的专称。鲁阳关历史悠久,虽然明确记载在战国时期,但可能早至春秋,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与中原各诸侯兼并的产物。鲁阳关初名鲁关,得名于鲁县,又随鲁县称鲁阳县而名鲁阳关。鲁阳关是春秋战国延至明清的三鸦道上要隘,是第二、三鸦路的起点,成为历史上汝州与南阳的地理坐标,一关两城分跨在历史上汝州与南阳交界处分水岭南北河水(鲁阳关水)谷地,相距近10里,今属南阳市南召县皇后乡分水岭村,鲁阳北关约在分水岭北四十里铺与五里铺间对角沟的地方,即“南召县鲁阳关——楚长城遗址”处,横跨灊河(北鲁阳关水)河谷;南关约在分水岭南,横跨鸦河(南鲁阳关水)河谷。鲁阳关在中国关津史上较为重要的地位体现在军事重地、交通要冲、历史典故及文学创作题材来源等方面,又以历经两千余年风云变幻的军事要冲为著。

传承与创新: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建设百年实践的发展历程

张锋在《红色文化学刊》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共同创造的、具有物质实体、制度规范和精神引领的独特的创造性活动及其结果。红色文化是一个具有上位意义的总括性概念,按结构层次可以分为红色物质文化、红色精神文化、红色制度文化三个方面。红色文化与红

色文化具体形态之间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红色文化是一个整体,内在包含了建党精神、井冈山革命纪念地等各种红色文化形态。同时,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精神在隶属于红色文化的基础上,又因产生的历史条件、时空背景不同而具有特殊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各自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两者的关系又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层次上的上位与下位关系,以及内容上的个性与共性关系。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标志性文化形态,红色文化历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发展延续至今,其历史背景是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历史源头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一产生就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指导,随着不同时代的发展和历史主题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不断与时俱进。

从《文选·七哀诗》看魏晋士人的 乱世情怀与家国理想

杨波在《中州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撰文指出,萧统《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其中收录《七哀诗》5首(曹植1首,王粲2首,张载2首)。这几首同题诗歌的创作者身份不同,内容有异,但都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体验与思考,分别代表了贵族公子式的个人感伤、文学侍臣的痛苦言说和仁人志士的乱世悲歌,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对文体文风的深刻影响。这些诗作表现出的主题倾向和创作风格,既抒发了魏晋士人浓郁深厚的乱世情怀,又充溢着积极进取的家国理想,具有较为鲜明的范式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单位变革性决策中的风险因素及管控艺术

杨启帆等在《领导科学》2021年11月上期撰文指出,变革性决策相较一般的决策活动有着独有的特点,其内部存在着变革性与持续性、创新性与保守性、机遇与风险三对矛盾关系。变革性决策中的风险因素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源于决策制定主体自身,反映为决策动机的迷失性、决策前景判断的主观性和决策主体的抗压性,称为内源性风险;另一种源于决策的外部环境,反映为决策利益

诉求的差异性、决策信息认知的偏差性和决策容错机制的失范性,称为外源性风险。决策者要做到端正价值取向、评估决策过程、完善应急预案,全面提升决策水平,最大限度地防范化解风险,避免变革性决策的夭折。

当代中国法理学主体性发展的内卷化及其克服

邹益民等在《法商研究》2021年第6期撰文指出,当代中国主流法理学的发展呈现专业化、技术化和功能化加强的趋势,与整个社会生活失去联系,并把技术上的强功效当作法律发展的标准,从而脱离、遮蔽与消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主体性发展上无甚作为,陷入内卷化困境。这是由中国法理学坚持片面肯定的现实观、无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力、无力反思中国主体性的可欲性所导致的。要破解这种内卷化困境,我们可以坚持反思的现实观,运用想象力,以此发展中国的法律形式,表达整体性的中国社会,形成自主的中国法理学立场,最终形成中国法理学的可欲的主体性。

党政干部视野中“为官不为”的原因与治理对策

郭广平在《兵团党校学报》2021年第6期撰文指出,从党政干部视角来审视当前“为官不为”现象的治理对策,应该更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在广大党政干部看来,治理转型过程中党政干部群体的无所适从,社会与行政环境中消极因素的影响,权责不一致、不清晰、不完整,激励机制与保护机制的不足是当前影响工作有效推进的几大因素。因此,营造治理转型与治理能力提升的空间,创造良好的行政环境,进一步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的落实,提升基层公务员待遇,建立有效的容错机制与纠错机制,是治理当前“为官不为”现象的有效措施。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合宪性疑虑及控制路径

陈辉在《南海法学》2021年第6期撰文指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业已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主要类型。本罪存在立法认定标准过于模糊、司法解释恣意扩大范围、司法认定标准简化为以事后未偿还推定主观恶意及以行为人事后的经济状况作为入

罪标准等问题,进而将刑法异化为催债法。透支信用卡入刑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银行持有的特定公共财产,但由于正常透支信用卡所产生的消费额度在本质上属于债权,在民事救济途径较为完善的情况下,无需与其他类似行为区别对待,启动刑罚权进行特别保护。否则,将会产生不符合平等原则、比例原则等合宪性质疑。基于宪法原则的导控功能,在立法暂时保留的情况下,应准确把握透支信用卡入刑的内涵,以“诈骗”框定本罪的边界,对司法解释进行合宪性控制。司法机关应负有禁止主动介入的消极义务,并就免罚免责的法律规定履行提醒告知义务,强化对“恶意透支”诈骗行为的审查义务。

服务型制造的发展背景及对策研究

侯红昌在《江苏科技信息》2021年第35期撰文指出,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新型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当前,河南制造业正处在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推动服务型制造加快发展意义重大,并且已经有部分企业在向服务型制造方面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文章认为要从构筑“二业”协同发展机制、提升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质量、加速金融业发展规模、拓展商务服务业发展业态、强化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优势等方面着力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

国家创新体系视域下健全成果评价及转移转化机制研究

梁红军在《学习论坛》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成果评价及转移转化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一环,是基于社会契约的创造传递价值过程,核心任务是把知识形态的成果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成果评价及转移转化政策环境持续优化,转移转化渠道日益畅通,但仍然存在着成果供给与社会需求结构性矛盾突出、转移转化模式方法单一、专业考核评价有效性不足、中介服务体系 and 法律法规有待完善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应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稳步提升高校及研发机构面向社会需求的创新能力,加快评价及转移转化专业化队

伍建设,发展成果评价及转移转化中介服务,完善金融支持成果评价及转移转化体系,持续营造有利于成果评价和转移转化的社会环境。

国家法律视域中党内法规的立法技术完善

郭世杰在《学习论坛》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中共党内法规制度具备了一定数量、形成了一定规模,其建设工作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以党章为中心的党内法规制度整体已经初步建成,但与完备化、体系化目标的实现还有距离。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应当在考察和掌握党内法规实施情况、实施效果的基础上,从奠定理论基础、正确认识体系化、树立基本原则、构建工作重点等角度入手,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概念术语、明确制定主体、厘清制定权限、改进制定技术、健全备案审查机制,以实现党内法规的科学化、合理化、体系化,达到与国家法律有机衔接和协调的状态,满足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的需要。

河南省产学研合作的网络演化及其空间特征

崔之珍等在《地域研究与开发》2021年第6期撰文指出,河南省产学研合作较为薄弱。产学研合作专利量占专利总量的比例较小,合作关系较为松散,尚未形成长期且稳定的合作关系;产学研合作主要以公司企业和高等院校的双方互动为主,三方之间的合作还较为稀少。河南省产学研合作网络仍处于初级发展水平。无论是产学研主体合作网络还是产学研城市合作网络,网络密度都较低,网络平均路径长度都较大,整体联系的紧密程度不高;产学研合作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较为鲜明,在产学研主体合作网络中高等院校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公司企业的活力与创造力有待进一步发挥;在产学研城市合作网络中郑州、洛阳等市的贡献度和控制度较高,周口、驻马店等市的影响力相对较弱。河南省产学研合作关系的空间分异特征鲜明。河南省北部、西部和中部的本地联系一般多于南部和东部地区,本地合作主要集中于郑州、新乡和洛阳等本地知识生产能力较强的城市;跨省域合作主要集中北京、武汉、徐州和西安等具有人才、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城市,北

京承担了河南省近20%的跨市又跨省域的产学研合作,是河南省多数地市获取省外知识的首选城市。河南省进一步加强各创新主体间的产学研合作已迫在眉睫。政府不仅需要发挥创新政策的导向作用,更需要加强其在产学研合作中的直接参与程度。

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对乡村政治组织建设的影响

李太森等在《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和实现形式、产业结构、收入结构、人口和群体结构、居住结构、需求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深刻影响着乡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基层政府组织的组织架构和功能目标。因应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必须强化乡村党组织体系建设,发挥好党的领导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必须适时推进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的转变,规范村(居)民自治的功能,及时拓展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必须搞好村(居)民自治权与行政管理权的无缝对接,充分发挥政府组织特别是乡镇政府在乡村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功能。

印度的流亡藏人政策(1951—1959)

王琛等在《史学月刊》2021年第12期撰文指出,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西藏部分上层分裂势力逃往印度,以噶伦堡为基地,与印度、美国秘密联系,进行分裂活动。1954年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订之前,印度严密监视流亡藏人的动向并禁止其进行公开政治活动,与此同时与其保持秘密联系。中印协定签订后,出于对中印边界及其他问题的考虑,印度领导人批准印度情报部门加强与流亡藏人的合作,为流亡藏人提供有限的支持。1957年年初达赖访印返藏后,流亡藏人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联系,印度加强对流亡藏人的管控,但仍然给予秘密支持。1959年西藏全面叛乱爆发后,印度开始公开支持流亡藏人的分裂活动。印度的流亡藏人政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的对华政策的变化,也对两国关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